

关于中央苏区列宁团校历史定位的考证

■ 胡献忠 蒋国栋

(中央团校 共青团中央青运史档案馆,北京 100089)

【摘要】列宁团校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少共苏区中央局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在中央苏区开办的一所培养党的青年工作干部的学校。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列宁团校的历史定位存在一些讨论。本文通过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有关团校创办事宜的文献史料、亲历者的回忆录、改革开放以来有关列宁团校的著述进行深度挖掘,综合各方面考证分析,以及赴列宁团校旧址实地勘察调研情况,基本上可以判定在中央苏区创办的列宁团校是一所名副其实的团校。

【关键词】少共苏区中央局 列宁团校 历史考证

DOI:10.16034/j.cnki.10-1318/c.2023.02.011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苏区开办的列宁团校,虽然存在时间不长,但在党的青年工作干部教育史上却具有重要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研究确定一批重要标识地,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彰显时代特色,使之成为教育人、激励人、塑造人的大学校。列宁团校处于中央苏区核心地带,是一座为党培养青年工作骨干的“红色熔炉”,具有红色基因、悠久历史和光荣传统。进一步明晰列宁团校的历史定位,对准确勾勒出列宁团校的历史轮廓、加强党的青年工作干部教育史研究、推进旧址的修缮工作、强化列宁团校旧址的教育功能、加快建设成为富有特色的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

一、开办团校是党、团组织探索青年干部培养的重要方式

早在1920年8月,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就推动成立外国语学社,作为培养青年干部的专门学校。1922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一直比较重视团干部的培训。而创办团校的探索则是从地方开始的。1923年11月30日,刘尔崧在《关于团独立支部地址人数及发团刊问题的报告》中提出:“为便利训练团员起见,《团刊》应每人发一份。包括干员:团校——尔崧、

收稿日期:2023-02-02

作者简介:胡献忠,中央团校共青团中央青运史档案馆馆长,教授,主要研究近现代社会思潮、党的青年工作理论、社会与政治运动;

蒋国栋,中央团校共青团中央青运史档案馆讲师,主要研究中共党史、毛泽东思想、中国青年运动史。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央团校2022年立项项目“关于列宁团校作为中央团校前身的考证”(课题编号:ZYTX6661802021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善铭(中央)、嘯仙。”^[1]这是现存革命历史文献中关于“团校”最早的记载^①。

1925年8月21日,《团广州地委特别报告(第六号)》指出:“广校训练班初办时,本使各同学确定团体的观念,然后再加以有系统的训练。所以当时决定的课程为:(1)C.P.与C.Y.;(2)少年国际;(3)第三国际;(4)怎样做学生运动和学生运动在中国民族革命上的意义;(5)怎样做青年工农运动;(6)内部组织与纪律问题。教员为:罗觉、延年、太雷、中夏。”^[2]团广州地委还决定“开办有定期的团校(三个月毕业),指定比较明白的同学和负重要工作的同学四十人为第一批。团校课程大纲照团刊上规定,主任教授为来杰。”^[3]这样看来,广州团校已经比较规范了。

除了广州地区之外,开办地方团校的还有江西安源。1925年初,团安源地委决定“开办团校,指定团员加入,予以主义的基本教育”,并规定教育的最低标准是:“(1)内部组织训练的教育:选择本团章程及各种议决案,加以详明之解释,使团员明白本团之内部组织和训练之原则;(2)主义的教育:灌输共产主义的基本原理,使团员了解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几种特性,以及解放之方法;(3)政治的教育:研究国内外之政治经济状况;(4)劳动运动和青年运动的教育;(5)纠正同志对旧社会一般观念的教育。”^[4]

1925年8月,团安源地委组织部对培训绩效做出评估:“安地有团校及训练班之组织,团校成绩尚好,训练班已有一班授完了课,成绩很好。”^[5]

二、中共中央明确提出开办“高级团校”的要求

1928年7月,为了加强团内政治教育工作,共青团五大提出“组织团校”^[6]“组织短期训练班或团校”^[7]“创办一些模范性质的学校和团校”“开办团校”^[8]的要求。1929年2月,团中央常委会强调“中央更须开始计划团校之创办”^[9]。

1931年2月19日,团中央通过的《团在苏区中的任务决议》明确提出:“应该在二个月内开办苏维埃区域内的团校。第一期学生可以从一百至一百五十人,三个月毕业。团校的目的在准备团的中下级干部。苏区中央局应该准备团校的教授大纲及指定负责人,以后应继续办下去并扩大它”^[10],要求“(少共苏区)中央局应在二月内开办团校”^[11]。同年7月14日,少共苏区中央局(即共青团苏区中央局)给团中央的报告中写到:“团校的创办,正在进行准备,须得经过一时期后才能开办。”^[12]这说明遵照团中央的指示,少共苏区中央局在1931年下半年已经开始在根据地内筹划建设团干培训学校的工作。

1932年2月15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共中央关于青年团工作的决议——听了团书记同志报告后的决议》,围绕加强团的组织问题,提出“应该进行新同志的支部书记的短期训练,并开办高级团校来训练与重新训练干部”^[13],并且强调“对于苏区中团的任务,中央认为团中央去年的关于‘团在苏区中的任务’的决议,必须迅速完成”^[14]。这一文件透露出两个关于团校的重要信息:一是中共中央赞同并要求开办“高级团校”来训练干部和重新训练干部;二是中共中央督促苏区(尤其是中央苏区)共青团要迅速完成《团在苏区中的任务决议》中的各项,其中包括开办团校。

三、列宁青年学校的举办为列宁团校的创办准备了条件

通过对现有史料的挖掘和研究可知,少共苏区中央局先后共举办了五期列宁青年学校。

^① 刘尔崧 1899年出生,广东紫金人,时任青年团广东区委执行委员,兼任团广州地委教育宣传委员,也负责广州团校的工作。

第一期为1931年10月至12月底；第二期为1932年2月初至4月底；第三期为1932年7月至10月；第四期为1932年11月下旬至1933年1月中上旬；第五期为1933年1月中下旬至2月中下旬。相关史料记载如下。

1931年10月，少共苏区中央局在江西瑞金叶坪举办第一期列宁青年学校。时任红四军直属队青年干部的梁必业在其回忆录《梁必业将军自述》和《我在人民军队》中有大致相同的记述：1931年10月，罗荣桓找梁必业谈话，让其作为红四军直属队青年干部人选，到少共中央列宁青年学校学习。“第二天，我背着包袱和毯子启程，经壬田市到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所在地瑞金叶坪报到，列宁青年学校就设在这里。全校有60多名学员，教室设在当地一个地主宅院里，……列宁青年学校的负责人是少共中央书记顾作霖和宣传部长陆定一，他们也是主要授课人。……在列宁青年学校，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同志亲自给学员讲政治形势、军事斗争和红军建设等问题。……1931年12月底，我从列宁青年学校毕业后，回红四军待分配工作。……我很快向罗政委汇报了学习情况，递交了学校的毕业鉴定。”^[15]

1932年1月21日，《三军四军十二军三军团的团与青年工作的竞赛条约》中提出，为了充分执行苏区团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一切决议，在少共中央局的领导下，订立三个月工作的竞赛条约。条约明确了团内的教育工作，写明“以军或军团（三军团）为单位，创办一期列宁青年训练班，以训练师的青年工作科人员与团的青年干事”，“要向政治机关提议对第二期列宁青年学校（少共中央局办的）的学生，选择最适合于中央局规定的条件的人”，并且明确了竞赛时间为“自本年二月一日起至四月三十日止。”^[16]据此推断，第二期列宁青年学校应该在此期间举办。

1932年7月3日，《少共苏区中央局关于冲锋季中发展团与改造团的具体计划》明确提出：“中央局应在冲锋季中举办第三期团校，训练县委工作干部，模范少先队中的团政治指导员及红军中师团青年工作干部”，同时要求“地方团部及支部对送到团校及训练班的学生，必须按照上级通知，慎重选送，反对过去不负责任派送的错误倾向。”^[17]结合1932年1月在《苏区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中的表述——“团校（列宁青年学校）”^[18]，笔者认为这里提到的“第三期团校”可以理解为“第三期列宁青年学校”。

1932年11月14日，《苏区少先队中央总队部命令》附则指出：“第四期列宁青年学校（已提前于十一月二十二日开学），看护班（十一月二十五日开学）以及派往红校训练（十二月三十日）的学生务须依时派人来，如有敷衍延误者，当以纪律制裁！”^[19]

1932年12月26日，《少共苏区中央局 少先队中央总队部联合通知》明确指出：“中央局与中央总队部决定在第四期列宁青年学校毕业后，立刻继续开办第五期，专门训练少先队的干部”，同时规定第五期列宁青年学校“训练时间——一个月”“入学日期——各地学生一定要在一九三三年一月十四日以前到达瑞金中央局与中央总队部所在地，决不允许有一个地方迟延履行时的。”^[20]

在相关文件的表述中，“列宁青年学校”是作为括号里的内容紧附“团校”之后的，这表明两者的名字基本上是通用的。尽管现存关于列宁青年学校的文献史料比较稀缺，但从查寻到的文献史料来看，少共苏区中央局举办五期列宁青年学校的史实是基本清晰的。应该说，这几期列宁青年学校（实际上是培训班）的举办为列宁团校的筹办做了积极探索和相关准备。

四、当事人的回忆真实再现了列宁团校创办的全过程和具体历史场景

提供重要史料再现列宁团校创建具体情况的，是两位当年参加过列宁团校培训的学员。一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授予少将军衔的肖锋，从1928年初起，他近60年如一日坚持写日记，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历史资料。另一位是长期从事青少年工作的赖大超。

肖锋(1916—1991),江西泰和人,参加列宁团校培训班时年仅15岁,当时担任少共赣粤边区信(丰)、(南)康、南(雄)地区工委组织部长兼代理书记。肖锋晚年关于列宁团校的回忆,最早见于1980年公开发表的《在列宁团校学习的日子里》。该文详细记述了他参加列宁团校培训学习的过程:“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二日,我接到少共江西省委的通知,要我到瑞金列宁团校学习。……团校设在洋溪,距庙背五里路。……洋溪是一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子,团校的办公室设在村中间一家地主的院落里,学生宿舍和教室设在村西头两家地主的大院里。这期学员共一百二十四人,都是十四到二十五岁的青年,其中女学员三十五人。学员到齐后,就分队编班。全校共分两个队八个班。我被分在六班,大家选我当班长。……十二月二十四日,举行开学典礼,红军总司令朱德、苏区中央局书记任弼时等中央首长出席了开学典礼。……任弼时同志宣布顾作霖同志兼任列宁团校校长。任弼时同志讲话后,杨副校长宣读了列宁团校第一期教育计划。学习时间,暂定两个月左右;学习内容,有党史、团史、政治、地理常识和游击战术等课程。教员由苏区中央局的领导同志担任:任弼时同志讲党史;顾作霖同志讲团史;徐特立、陆定一同志讲地理、政治常识;总参作战科王科长讲游击战术。杨副校长还宣布了一个好消息:毛主席将亲自到团校来,讲授中华苏维埃运动史。……团校还规定:少先队员不准抽烟,不准喝酒,不准吃辣椒。这三点必须做到,如有犯者,要受纪律处分。……二月廿五日早晨,……在这个幸福的时刻,毛主席来到了列宁团校,我们全校师生集合在大祠堂里,听毛主席讲课。……两个多月的学习生活很快就过去了。二月二十九日列宁团校第一期正式结业。校领导邀请朱总司令、周总政委、任弼时、顾作霖等领导同志到会。……周总政委还勉励我们发扬共青团的革命传统和作风,做反‘围剿’的先锋战士。”^[21]

该文作为目前最早提及“列宁团校”的文献,把列宁团校创办的时间、地点、参加人数、课程内容以及开学典礼、结业仪式等基本情况讲得很清楚。随后,肖锋又在其回忆文章《对瑞金革命旧址的一些回忆》(1981年)、回忆录《十年百战亲历记》(1983年)中提到列宁团校的相关情况。比如,“过了绵江河,走不远,就到了洋溪村。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就驻在这村的北头三栋砖瓦房里。它是党校的前身。……在这栋的后面,是我们的列宁团校。校长顾作霖,副校长杨岳彬。团校只在一九三二年十一月至一九三三年二月底办了一期,男学员九十多人,女学员四十多人。我是这一期的学员,并兼少共总支书记。在洋溪住过的,我记得有朱德、周恩来、董必武、刘伯承、罗明、杨尚昆、杨岳彬等。”^[22]肖锋公开发表的相关回忆录都是根据自己的日记并重访革命旧址进行核实后补充整理而成的,可信度比较高。

2010年,肖南溪整理其父遗稿,出版《肖锋征战记》,其中关于列宁团校的记述与之前的肖锋回忆的时间、地点基本一致。其中还专门讲到,列宁团校第一期学习结束后,“团校选择做过团的工作的党员王炳章、邱会玉(女)和我留下到中央党校(即马克思主义大学)第一期继续深造。党校就设在团校老房子,我们由东房搬到北房就算报到了。”^[23]

另一位亲历者赖大超(1918—1995),福建永定人,参加列宁团校第一期培训班时才13岁,当时担任少共福建省委儿童局书记。晚年出版了《一个红小鬼的风雨人生》,书中回忆了在列宁团校学习的历史点滴。其记述与肖锋的回忆高度契合,只有三处细节略有不同:(1)赖大超回忆录中写到:“学生共有一百二十余人(其中女生三十余人),分为二队六个班”;肖锋回忆录中写到:“全校共分两个队八个班”。(2)赖大超回忆录中关于学习的课程,没有提及游击战术;肖锋回忆录中写有总参作战科王科长讲游击战术。(3)赖大超回忆录中对毛泽东亲自来团校讲授中华苏维埃运动史没有提及;肖锋回忆录中记述得比较详细。

五、对办学地点、时间及名称由来的考证

关于列宁团校的创办地点。根据梁必业的回忆,第一期列宁青年学校就设在叶坪。这里的“叶坪”应该不是叶坪乡的叶坪村,而是指叶坪乡范围内的某一村子。根据现有文献史料分析,极有可能就是距庙背村2.5公里的洋溪村。这就是说,随后的几期列宁青年学校很可能都是在洋溪村举办的。理由如下。

第一,1931年9月28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和红一方面军总部从兴国进驻瑞金县叶坪村。同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叶坪村召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诞生并在此办公。少共苏区中央局于1931年9月由永丰县龙岗迁驻瑞金叶坪乡庙背村,距叶坪村约1.4公里。由此可见,少共苏区中央局连办公地都没有选在叶坪村,更不可能把列宁青年学校放在当时党、政、军核心单位的驻地来举办了。

第二,为了方便工作联系和指导,列宁青年学校的举办地也不可能选择离苏区党的机关和团的机关太远的地方。洋溪村位于叶坪村西北方向仅1公里处,有百十户人家,绝大多数为刘姓,有几处地主大院、宗族祠堂可以借用,列宁青年学校第一期很有可能选址此地。1931年11月,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成立,机关设在洋溪村,代部长徐特立在此办公和居住;1932年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创办的无线电训练班由福建长汀迁至洋溪村,改名为“军委无线电学校”,后改称“中国工农红军通讯学校”;1932年10月,由徐特立主持,中央列宁师范学校在洋溪村创办。这些情况都可以作为洋溪村适合办学的旁证。另外,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在洋溪村刘氏宗祠成立,朱德、王稼祥、叶剑英曾在这里办公或居住。

第三,根据2022年4月和8月两次对叶坪乡洋溪村刘曰蓁私宅现场踏勘,可以看到刘宅房屋的内墙上保存了大量革命标语和漫画。其中二楼房间的墙壁上清晰写有“少班”(“少”应该是“少共”的简称)、“打倒国民党”“打倒蒋介石走狗”“拥护全国苏维埃万岁”“拥护中国共产青年团万岁”“学习马克思(思)”的字样,在楼板上写有“初级班列宁室”等。从目测情况来看,有部分字迹年代比较久远,可以作为当年列宁团校学员在该处私宅中学习住宿的证据。

关于列宁团校的创办时间。现有文献史料显示,第四期列宁青年学校是1932年11月22日开学的,第五期开办时间应该在1933年1月中下旬。而根据肖锋、赖大超的回忆,列宁团校的开学典礼是1932年12月24日。如果这三个学校都在洋溪村开办,那么列宁团校就在时间、地点上同这两期列宁青年学校相互交叉。尽管缺乏相关历史文献的记述,考证组根据现有材料推测:列宁团校是在第四期列宁青年学校的基础上试办,而且第五期列宁青年学校有可能也并入了列宁团校培训中。理由如下。

第一,1932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要求“开办高级团校来训练与重新训练干部”。这就是说中共中央局对团干部的培训有更高的要求。少共苏区中央局根据前三期列宁青年学校的举办经验,致力提高一层,也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根据肖锋1980年的回忆,周恩来在结业大会上讲到“试办的列宁团校”^[24]。这就解释了列宁青年学校本来正在按期举办的情况下还要举办列宁团校的理由,也基本解释了在中央苏区的文献史料中没有提到“列宁团校”的原因。

第二,据赖大超回忆,“1932年11月的一天”接到去中央列宁团校学习的通知,他们“到达瑞金团中央局后,在那儿住了一晚,然后便和王汉英同学到附近只有几十户人家的洋溪村列宁团校报到。”“12月下旬的一天,团校举行开学典礼”^[25]。这可以解释第四期列宁青年学校是11月22日开学,到12月24日开学典礼时就改称“列宁团校”了。而且,肖锋在1981年的一次回忆中也说到,“团校只有1932年11月至1933年2月底办了一期”^[26]。由于当时处于紧张的战争年

代,抽调骨干集中学习并不是一件轻松容易的事情。学员接到通知有先有后,报到时间更是参差不齐。因此,在少共苏区中央局的通知中,多次强调“务须依时”“决不允许……迟延误时”等词句,而事实上很难做到准时报到、准时开学。同样是参加列宁团校的培训,肖锋是1932年12月12日接到通知的,比赖大超晚了许多。

第三,根据肖锋1980年的回忆,列宁团校第一期开班时有学员124人,结业时学员为146人。似可以解释为有后续学员(比如第五期列宁青年学校的学员)加入。

关于列宁团校的名称来历。考证组遍查土地革命时期的历史文献《红色中华》《青年实话》《列宁青年》《少年先锋》《红星》《苏维埃》及相关文件,均未发现“列宁团校”这一名称。现可以初步判定,“列宁团校”最早出现在肖锋1980年公开发表的回忆性文章《在列宁团校学习的日子里》。赖大超1998年在回忆录《一个红小鬼的风雨人生》中也提到,1932年11月去洋溪村列宁团校报到的事。如何解释这一问题呢?

第一,1932年1月苏区团一大通过了《政治议决案》,其中有“团校(列宁青年学校)”的表述。这就是说,当时“团校”与“列宁青年学校”是可以并称的。

第二,少共苏区中央局机关刊物《青年实话》1932年上半年刊载的文章中曾出现过“中央团校”名称。1932年5月,时任少年先锋队中央总队部总训练部部长张爱萍在《这就是对斗争的逃避》一文中写道:“赖仁钊同志,是中央团校的学生,是临时省委派去的,在三四个月中,除天天在那里干些消极怠工的勾当外,整天东跑跑,西趟趟。”^[27]1932年6月,赖仁钊在《接受张爱萍同志对我的批评》中也承认:“我在中央团校毕业后,由江西省委分配我到广昌工作。临时少共广昌县委,从三次战争胜利后成立到现在,已有八九个月了。”^[28]从张爱萍1932年5月的发文内容可以推测出这里的“中央团校”指的是第一期列宁青年学校,而张爱萍他们理解为少共苏区中央局办的团校,故有此称。这在当时的中央苏区有一定的普遍性。

第三,战争年代办学不像现在这么严谨规范,在正式文件中出现的“列宁青年学校”,常常被学员和干部口头上称为“少共中央列宁青年学校”“中央列宁青年学校”,诸如此类。

第四,如果列宁团校第一期在列宁青年学校第四期基础上试办的假设成立,那么“列宁团校”的名称在文件中没有出现、而在当事人的回忆出现就说得通了。

六、改革开放后相关专家的一致认定

1988年7月出版的《教育百科全书》载有:“列宁团校 1932年在江西苏区举办的一所青年学校。同年12月24日,列宁团校第一期在江西瑞金洋溪村举行开学典礼,红军总司令朱德、苏区中央局书记任弼时等出席。……1933年2月25日,毛泽东为列宁团校讲课。2月29日第一期结业,周恩来到会勉励学员”^[29]。

1989年7月,由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静如等主编、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青年运动词典》关于“列宁团校”条目的解释内容为:“1932年在江西苏区创办的一所青年学校。1932年12月24日,列宁团校第一期在江西瑞金洋溪村举行开学典礼。”^[30]

1991年11月出版的《教育大辞典》记述为:“1932年12月,中共中央局决定在江西瑞金县洋溪村创办列宁团校。”^[31]

1993年2月,由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运史研究所编写、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史词典》将“列宁团校”解释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共青团在江西中央苏区创办的一所青年干部学校。……1932年……12月24日,列宁团校第一期在江西瑞金洋溪村举行开学典礼。”^[32]

1998年2月,由中共瑞金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写、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瑞金人民革命史》也记载着“中央列宁团校,址设洋溪刘曰葵私宅”^[33]。该书执行主编曹春荣谈到,此书所论依据的是20世纪60年代瑞金县委县政府组织开展的第一次革命旧居旧址调查结果,有据可查,真实可信。该书副主编刘庆芳是洋溪村人,也参与过这次革命旧居旧址调查。在调查中听村民刘善宝谈及过列宁团校就在刘家对面。这一线索对确定列宁团校旧址提供了重要依据。

2009年4月,由共青团赣州市委和中共赣州市委党史办公室编写、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央苏区青年运动史》记载:“列宁团校……地址在江西瑞金洋溪村……团校校长顾作霖(兼),副校长杨XX,任课教员有任弼时、顾作霖、徐特立、陆定一、以及总参作战科王科长。”^[34]

2019年8月,由中共党史学会编辑、中共党史出版社和党建读物出版社联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组织机构辞典》列有“列宁团校”条目,其释义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创办的培养共青团干部的学校。1932年12月,在江西瑞金成立,顾作霖任校长。第一批学员共124人,都是14至25岁的青年。学校主要教授党和团的历史、政治以及游击战术等内容。”^[35]

七、中央苏区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领导下的最大的“一块试验田”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随着土地革命的兴起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毛泽东、朱德领导的赣南、闽西根据地成为全国最大的根据地。中共中央决定将苏区中央局和苏维埃中央政府设在这里。根据中共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1931年1月,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小布正式成立,由中央派来的项英担任代理书记,领导中央苏区的一切工作。4月,为加强对中央苏区青年运动的领导,少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青塘成立,由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顾作霖担任书记。其实,在两个月前,共青团中央局就明确提出,“(团)中央指定的苏区中央局,应该立即与(苏区)党的中央局发生关系,在它的领导之下工作”“(少共苏区)中央局应该经常地向团的中央局报告工作,每两星期工作报告及派交通到中央”^[36]。因此,少共苏区中央局成立后,积极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工作指示和精神要求,“加紧苏维埃区域的青年运动的领导,帮助党执行苏维埃区域内的一切最紧迫的任务”^[37]。因此,与其他根据地相比,中央苏区具备更为扎实的落实党中央和团中央相关指示、政策的充要条件,列宁团校的举办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由于“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的错误方针指导,1933年初,中国共产党在白区的工作几乎损失殆尽,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已无法立足。团中央机关也遭到严重破坏,被迫于1933年1月同临时中央一道迁入中央苏区。团中央驻瑞金沙洲坝下肖村,4月与少共苏区中央局合并,对外称少共中央局(即共青团中央局)。原少共苏区中央局书记顾作霖转任少共中央局书记。

八、从办学规格、办学标准等方面情况看,列宁团校已经具备了高级团校的基本特征

从当事人回忆的具体历史场景及相关文献史料来看,列宁团校的办学规格、办学标准、办学要求都是非常高的,已经基本具备了高级团校应有的特征。所以,赖大超回忆录中记述在列宁团校学习情况的章节,标题使用的是“在中央团校和中央党校学习”^[38]。也有研究者评价道:“列宁团校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最早的中央团校”^[39]。

从办学规格看,在当时是最高配置。校长人选是由中共苏区中央局宣布任命的。开学、结业典礼均有中央领导同志出席并发表讲话。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

任弼时出席开学典礼,任弼时发表讲话;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出席结业仪式,周恩来发表讲话。

从培训管理来看,采用分队编班制。124名学员来自不同军队和地方,如有少共赣粤边区信康南地委工委组织部长兼代理书记肖锋、少共赣粤边区信康南地委工委儿童局书记肖曼玉、少共福建省委儿童局委员兼汀州市委儿童局书记赖大超等人,共分为两个队八个班进行管理和教学,并成立了少共总支部,下设两个支部。

从课程设置看,比较全面。学员主要学习中共党史、团史、苏维埃运动史、政治和地理常识、游击战术等,设有列宁室满足学员自习,并提供篮球、排球、歌咏、舞蹈等丰富多彩的业余生活,举行军事演习,这些是地方团校无法实现的。1932年3月,少共湘鄂赣临时省委开办了一期团校,但因“团校教材缺乏”“没有收到好大效果”^[40]。

从授课人员看,分量很重。比如,中共党史由任弼时讲授,顾作霖讲团史,徐特立、陆定一讲地理、政治常识,总参作战科的同志讲游击战术,毛泽东亲临团校作中华苏维埃运动史报告,这些也是地方团校无法实现的。1932年5月,少共赣东北省委报告称曾开了一期团校,但“因教育人员的关系,以后停办了”^[41]。

结论:通过对中央苏区各种历史文献进行全口径梳理和研究,少共苏区中央局于1932年12月在瑞金洋溪村创办列宁团校的史实呈现客观清楚。无论是从列宁团校的办学地点、办学时间,还是办学规格、课程设置、授课人员等方面看,都充分体现出完全遵照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开办高级团校的指示,并同团中央关于开办团校的决议要求高度契合。再者,列宁团校在办学过程中提出的理论学习、考试测验、纪律准则等方面的要求,对比地方团校都是比较高的、比较严的,这也是论证列宁团校历史定位的重要依据。综合以上各方面的考证分析,以及到列宁团校旧址实地勘察调研情况,基本上可以做出判定:列宁团校是名副其实的高级团校。

[参 考 文 献]

- [1] 中央档案馆 广东省档案馆:《尔崧关于团独立支部地址人数及发团刊问题的报告(1923年11月30日)》,载《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82年第1册。
- [2][3] 中央档案馆 广东省档案馆:《团广州地委特别报告(第六号)——关于郭寿华的错误、团员训练班、海丰成立地方团等问题》,载《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82年第1册。
- [4] 本书编辑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安源地委半年内教育宣传计划(1925年初)》,载《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上册),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1年版,第430-431页。
- [5] 本书编辑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安源地委组织部关于二至七月份工作报告(1925年8月25日)》,载《湖南青运史资料选编》,1988年第2辑。
- [6]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办公厅:《政治任务决议案》,载《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1957年第4册。
- [7]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办公厅:《教育宣传工作决议案》,载《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1957年第4册。
- [8]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办公厅:《苏维埃区域内本团工作大纲》,载《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1957年第4册。
- [9]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办公厅:《五次大会后本团工作总结决议案(1929年2月20日)》,载《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1958年第5册。
- [10][11][36]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办公厅:《团在苏区中的任务决议》,载《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1960年第9册。
- [12]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办公厅:《苏区团中央局报告》,载《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1960年第9册。
- [13][1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9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49、149页。
- [15] 梁必业:《梁必业将军自述》,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3-15页。
- [16] 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 中共赣州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 中共龙岩市委党史研究室:《三军四军十二军三军团的团与青年工作的竞赛条约》,载《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军事系统10》,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南昌:江西人民

出版社2015年版,第1084—1086页。

[17] 共青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一册),北京: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版,第165页。

[18]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办公厅:《苏区团第一次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载《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1960年第10册。

[19] 共青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苏区少先队中央总队部命令》,载《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1988年第11册。

[20] 共青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少共苏区中央局 少先队中央总队联合通知》,载《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1988年第11册。

[21][24] 肖 锋:《在列宁团校学习的日子里》,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版,第56—68、68页。

[22][26] 肖 锋:《对瑞金革命旧址的一些回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32、432页。

[23] 肖 锋 南 溪 孙 翊:《肖锋征战记》,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44—46页。

[25][38] 赖大超:《一个红小鬼的风雨人生——赖大超回忆录》,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第22—23、20页。

[27] 爱 萍:《这就是对斗争的逃避》,载《青年实话》,1932年第17期。

[28] 仁 钊:《接受张爱萍同志对我的批评》,载《青年实话》,1932年第20期。

[29] 张念宏:《教育百科辞典》,北京: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88年版,第604页。

[30] 张静如 等:《中国青年运动词典》,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81页。

[31] 顾明远:《教育大辞典》(第三卷),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361页。

[32]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运史研究所:《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史词典》,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8页。

[33] 中共瑞金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瑞金人民革命史》,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82页。

[34] 共青团赣州市委 中共赣州市委党史办公室:《中央苏区青年运动史》,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47页。

[35] 谷安林:《中国共产党历史组织机构辞典》,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9年版,第206页。

[37]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办公厅:《共青团中央关于反对军阀进攻苏维埃区域反对国民会议决议》,载《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1960年第9册。

[39] 共青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苏区共青团专题论文集》,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版,第31页。

[40]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办公厅:《湘鄂赣团临时省委给苏区团中央局的报告》,载《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1960年第10册。

[41]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办公厅:《团赣东北省委报告》,载《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1960年第10册。

(责任编辑:韩永涛)